

思想自由 兼容并包

要有良好的社会，必先有良好的个人，要有良好的个人，就要先有良好的教育。

——蔡元培

一个肮脏的国家，如果人人开始讲规则而不是谈道德，最终会变成一个人人味儿的正常国家，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！
一个干净的国家，如果人人都只讲规则而不谈道德，人人都不讲规则而只谈道德，人人都不

北大

哲学智慧

你裙，越短越好！——林语堂

山自重，不失其威峻，海自重，不失其雄浑，人自重，不失其尊严。

——辜鸿铭

中国人相信历史是一个周而复始的循环过程，总是怀念先前的某一个朝代，所以中国走到

张祥斌◎主编



长江出版传媒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北大

哲学智慧

张祥斌◎主编



长江出版传媒
长江文艺出版社

新出图证(鄂)字03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北大哲学智慧 / 张祥斌 主编

武汉: 长江文艺出版社, 2013.9

ISBN 978-7-5354-6762-1

I. 北… II. 张… III. 北京大学—名人—生平事迹 IV. K820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128134号

责任编辑: 王妮 牛静敏 高田宏

责任校对: 陈琪

封面设计: 回归线视觉传达

责任印制: 左怡 包秀洋

出版: 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

邮编: 430070

发行: 长江文艺出版社

电话: 027-87679360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印刷: 首壹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 710毫米×1020毫米 1/16

印张: 14.375

版次: 2013年9月第1版

2013年9月第1次印刷

字数: 163千字

定价: 28.00元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 027-87679308 87679310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北大
哲学智慧



老到、善于表演、懂得配合，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。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，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。”这是北京大学著名教授钱理群在“理想大学”专题研讨会上的讲话。这段话被参会嘉宾发上了微博后，迅速被转发 3.5 万次，随后又引起无数人的共鸣。

也许我们这一代人处在中国历史的转折时期，就必然既要背负历史的遗产、担负改革的重任，又要面对未来的挑战。这是一个充满了痛苦、疑惑、反复、犹豫的过程，但是无论何时，也不该丢掉中华民族的智慧和灵魂！

北大名人辈出，群星灿烂，我们也只能筛选一些有影响力的代表人物，对他们的生平做一些简单的描述。同时，我们也有意无意地回避了一些事情，我们高谈北大的辉煌，却不愿触及北大的悲壮。老北大的历史越灿烂，名人越多，越暴露出现实北大面临的种种困境。当很多时候我们人为地拔高北大的名气和地位时，实际却是在无意间露了内心的某种怯懦和期盼。回望那些逝去的岁月和远离的大师们，我们是否会更为当今的大学教育感到几丝隐忧呢？

前言



1917年的北大，有这样一群20多岁的年轻人：徐悲鸿，23岁；梁漱溟，25岁；胡适，27岁；刘半农，27岁；刘文典，27岁；林损，27岁；刘师培，33岁；周作人，33岁；陈独秀，38岁……虽然他们年纪轻轻，有的甚至比在校的大学生大不了几岁，但他们的名字却响彻大江南北，有些人的名气即使在国际上也如雷贯耳。

当下大部分20多岁的年轻人，不是苦苦挣扎在求职的道路上，就是“啃老一族”，而我们的前辈们在人生的这一阶段已经成为了大师。这真让我们当代的年轻人汗颜和无地自容，也让我们再一次想起钱学森的世纪之问——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？这一振聋发聩之问，正是向每一个有忧患意识的国人提出的。

回想老北大，诸多名家各领风骚，他们鲜活的人物个性让人喜爱，也令人感慨。老北大用人有一个特点：英雄不问出处，不论文凭学位，只要有才学就可以上北大讲坛。在那个“城头变幻大王旗”的年代，多亏了蔡元培先生肯为年轻人提供大舞台，才有了大师们各具不同的真性情流露。

时过境迁，当今国内学术界的某些人却日渐沉沦，追逐名利，一切向钱看，到处阿谀奉承、歌功颂德，毫无文人气魄可言。“我们的一些大学，包括北京大学，正在培养一些‘精致的利己主义者’，他们高智商、世俗、

目录

001

哲言：语不惊人死不休 ——大师们的“惊世之言”

- 爱情诗人徐志摩 / 001
- “天下第二”的林损 / 007
- “大炮”傅斯年 / 012
- 为庄子而跑的刘文典 / 019
- 哲学狂者熊十力 / 026
- 幽默大师林语堂 / 033
- 最后的儒家梁漱溟 / 039
- 文学大师沈从文 / 045
- 铁嘴钢牙李肇星 / 051

059

哲学：世事洞明皆学问 ——工作中的另类哲学

- 铁肩辣手邵飘萍 / 059
- 辜鸿铭的辫子 / 065
- 北大怪才黄侃 / 071
- 钱玄同的小木戳 / 076
- 马幼渔的“女权至上” / 083
- 画坛伯乐徐悲鸿 / 088
- 交友遍天下的胡适 / 095
- 厚今薄古的范文澜 / 102
- 百度之父李彦宏 / 108

目 录

114

哲人：天生我材必有用

——才智卓越的北大名人

- 学术名家刘师培 / 114
- 严复译著《天演论》/ 121
- 文坛魁首刘半农 / 126
- 北大之父蔡元培 / 133
- 散文名家朱自清 / 140
- 蒋梦麟笑说北大“功狗” / 147
- 文化杂家周作人 / 154
- 地质学家李四光 / 161
- 北大教授季羡林 / 167

174

哲理：粉身碎骨浑不怕

——使人的精神新生的理论

- 共产党的创始人李大钊 / 174
- 不屈的斗士鲁迅 / 180
- 爱赞美学生的沈兼士 / 186
- 史学名家顾颉刚 / 191
- 人口学家马寅初 / 197
- 冯友兰的天地境界 / 204
- 美学大师朱光潜 / 210
- 留学教父俞敏洪 / 216

哲言：语不惊人死不休

——大师们的“惊世之言”

爱情诗人徐志摩

世上有永恒的爱情，但没有凝固的爱情。爱情是一条河，它的源头必须有足够的水源，才能永远奔流不息。这水源产生于两人的情感交流和融合，产生于双方对爱情理解的升华与深化。如果女人不以自己的灵魂吸引男人的灵魂，而是拼命美化自己的外表来吸引男人的感官，那么吸引来的也只是一个以欣赏低层次感官为主的男人。如果爱情再进一步，走到婚姻阶段，更不是那么简单，两个人要长期地生活在一起，因此双方都需要考量是否能够接受对方的个性习惯。徐志摩与林徽因，有爱情之花却无婚姻之果，这也缘于两个人对爱情和婚姻的追求有所不同。

1926年10月3日，徐志摩（1897—1931）与陆小曼的结婚仪式正在热闹地进行，宾客欢聚一堂，分享着新人的幸福。证婚人梁启超注视着新郎和新娘，说出了一段令人咋舌的祝婚词：“徐志摩，你这个人性情浮躁，所以

在学问方面没有成就，用情不专，以致离婚再娶；陆小曼，你也是过来人，离过婚又重新结婚，也是用情不专。希望你们不要一错再错自误误人，不要以自私自利作为行事的准则，不要以荒唐和享乐作为人生追求的目的，不要再把婚姻当作是儿戏，以为高兴可以结婚，不高兴可以离婚，让父母汗颜，让朋友不齿，让社会看笑话……”徐志摩不得不小声哀求：“先生，给学生留点脸面吧。”梁启超也觉得话有些过重，就顺势收住了嘴，慈爱地说：“以后你们两个人要痛自悔悟、重新做人！愿你们这次是最后一次结婚！”

一年前，徐志摩与北京名媛陆小曼认识后，两个人立刻陷入热恋中，无奈陆小曼已是夫之妇。随着两个人感情渐深，都有“相见恨晚”之感。在历经周折之后，陆小曼离婚了，两个人终于走到了一起。徐志摩的父亲对儿子草率的婚姻态度极不满意，他虽然勉强答应陆小曼与徐志摩的婚事，但提出了三个条件：一、结婚费用自理，家庭概不负担；二、婚礼必须由胡适做介绍人，梁启超证婚，否则不予承认；三、结婚后必须南归，安分守己过日子。这三个条件徐志摩都答应了。

其实梁启超也反对徐志摩与陆小曼之间如同儿戏的恋情，也规劝过徐志摩，碍于徐志摩之父和胡适的情面，才答应担任证婚人。之后才有了梁启超在婚礼上对徐志摩、陆小曼用情不专的厉声训斥，一点情面不留，使满堂宾客瞠目结舌的一幕。

和所有的爱情作品一样，男女主人公历尽艰难结婚后，故事就结束了，没看头了。徐陆的婚姻也如此！幸福是短暂的，痛苦却来得很快，婚后陆小曼与徐志摩在性格上的差异逐渐显露出来。婚后的陆小曼全没了当初恋爱时的激情，似乎不再是一个有灵性的女人。她每天懒散到午后才起床，下午写写画画或者见几个朋友，晚上大半是跳舞、打牌、听戏，成为一个懒散的家庭妇女。徐志摩常常婉转地劝告陆小曼，但效果不大。后来，徐志摩的父亲出于对陆小曼的极度不满，在经济上与他们夫妇一刀两

断。徐志摩不得不同时在光华、东吴、大夏三所大学讲课，课余还赶写诗文，以赚取稿费贴补家用。即便如此，仍不够陆小曼挥霍。徐志摩的不幸也正缘于这段草率的婚姻，所以也奉劝大家，爱情和婚姻是不一样的。爱情浪漫无限，婚姻则是柴米油盐酱醋茶，千万别被冲动的爱情迷惑了双眼而草率结婚。

1930年秋，徐志摩应胡适之邀，再次出任北京大学教授，兼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授。徐志摩北上的同时，极力要求陆小曼也随他北上，幻想着两个人到北京去开辟一片新天地，陆小曼却固执地拒绝了。徐志摩只好一个人独来独往。1931年11月19日，徐志摩为了赶上林徽因当天晚上的一场讲演，迫不及待地搭乘了一架邮政机飞往北京。登机之前，他给陆小曼发了一封短信，信上说：“徐州有大雾，头痛不想走了，准备返沪。”但最终他还是走了。因大雾影响，飞机在济南党家庄附近触山爆炸，徐志摩身亡。徐志摩死后，陆小曼痛悔不已，她在书桌前写下“天长地久有时尽，此恨绵绵无绝期”，从此不再出去交际。很多人都是在失去对方后才知道感情的可贵，这也许是人的通病吧。

年富力强、创作力旺盛的徐志摩带着无限的留恋离开了，给后人留下无尽的长叹。这位才华横溢的爱情诗人是1917年进入北大就读的。在北大，他的生活增添了新的内容，他的思想注入了新的元素。在这所高等学府里，他不仅钻研法学，而且攻读日文、法文及政治学，并涉猎中外文学，这燃起了他对文学的浓厚兴趣。这一时期徐志摩广交朋友、结识名流，由人介绍，他拜梁启超为老师，还举行了隆重的拜师大礼。梁启超对徐志摩的一生影响是非常大的，他在徐志摩心目中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。梁徐虽系密切的师徒关系，但他们二人的思想差别还是存在的，已经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的徐志摩，不顾一切地舍命追求自己理想的人生，包括他要争取婚姻恋爱自由。

1921年，徐志摩去英国留学，入伦敦剑桥大学当特别生，研究政治经济学。在资本主义发达的英国，徐志摩接受了西方教育及欧美浪漫主义和唯美派诗人的熏陶，对他的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。在紧张的学习生活中，诗人如醉如痴地欣赏着异国风景和异国美女，虽然他已经结了婚，但是他那颗活力四射的心却在异样地跳动着。直到有一天，他见到了随同父亲来到伦敦的中国才女——林徽因，他的一生就此改变。

徐志摩疯狂地爱上了“人艳如花”的美女林徽因，并在1922年3月向在国内的原配夫人张幼仪提出离婚。然而，林徽因仔细考虑了之后，却拒绝了诗人的追求，不久匆匆离开英国，后来嫁给了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。林徽因没有嫁给徐志摩，当然是有原因的：以身世而论，林家是名门，徐家不过是当地有钱的商人。再者，两人相差8岁，徐结过婚，且有一子，林还是个姑娘。但是，林徽因并非没有动心，她几乎就同意了徐志摩的求婚，然而，婚姻和爱情不可兼得，两个人还是没能牵手，林徽因一生都很怀念她与徐志摩的这段感情。林徽因是明智的，她觉得徐志摩爱上的只是完美的她，是诗人眼里的美的化身，这会给她的一生带来沉重的压力，所以她最后选择了踏实沉稳的梁思成。

林徽因离开了伦敦，让诗人徐志摩十分伤感。在他写给林徽因的那首有名的诗——《偶然》中写道：“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，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——你不必讶异，更无须欢喜——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。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，你有你的，我有我的，方向；你记得也好，最好你忘掉，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！”这是徐志摩对林徽因感情的最好的自白，一见倾心而又理智地各走各的方向，这就是世俗所难理解的一种纯情。

没有了林徽因的伦敦，也失去了绚丽的色彩和欢歌笑语。1922年，徐志摩匆匆结束在英国的留学生活，循着林徽因的足迹回到国内。他流连在林徽因出现的所有场所，为的是再睹她的芳容。两年后，徐志摩进入北大

担任教授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一个重要人物的到来让他全身心投入其中，慢慢地将对林徽因的感情压抑在内心的最深处，不许它有半点泛滥。

这个大人物就是印度大诗人泰戈尔，徐志摩听说他要访华，非常开心，他是真心崇拜泰戈尔，可以说没有一丝杂念。在泰戈尔来华前，徐志摩俨然是泰戈尔的中国使者：他频繁地与泰戈尔通信，安排他来华的具体细节，一有机会就宣传泰戈尔。他在报刊上发表一系列的文章，与其他欢迎者一起努力营造了一种热烈的欢迎气氛，然后自豪地写信告诉泰戈尔：“我们已准备停当以待尊驾莅临。”

可能就是因为这种极端的崇拜，徐志摩没能向中国人客观地介绍泰戈尔，而是带有强烈的个人感情色彩，从而使人认识不到泰戈尔的真面目而产生精神上的隔阂。泰戈尔在中国到处宣传以爱对抗暴力，大谈精神文明、博爱主义。这在革命者看来就是在消磨人们的革命意志，所以觉得有必要亮明自己的观点，以消除泰戈尔的宣传所造成的“负面影响”。中国文化界因泰戈尔的到来迅速分成两个战线分明的阵营：一方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成果的捍卫者和左翼文化人士，包括陈独秀、郭沫若、茅盾、瞿秋白、吴稚晖、沈泽民、林语堂等，要“疾颜厉色送他走”；另一方则以梁启超、徐志摩、胡适等为代表，千方百计为他辩护。一时间唇枪舌剑，形成一场空前的舆论鏖战。徐志摩对泰戈尔受到激烈的批评当然感到非常愤怒，但他始终都没明白自己也应承担一定的责任，这是他性格的悲剧，也是其思想的悲剧。可以说，无论是在精神上、思想上还是在性情上，泰戈尔都是徐志摩一生最为崇拜的偶像，也是他最知心的朋友。

泰戈尔走后，徐志摩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，他每日教学之余，就四处交友，或者去咖啡厅寻找灵感。这期间，他也结识了几个非常优秀、年轻貌美的才女，可惜诗人偏偏都错过了好姻缘。直到他遇到陆小曼，两个人就像“老房子着了火”一样，一发不可收拾。爱得惊天动地，爱得死去活

来，最后两个人终成眷属，但是结局却那么凄惨，让人不忍回顾。

诗坛巨星英年早逝，噩耗传来，震惊了海内外，胡适连呼：“天才横死，损失的是中国文学！”在徐志摩的许多朋友中，无论是师辈的梁启超、同辈的郁达夫，还是晚辈的沈从文等，没有一个不赞赏佩服他的才华和品行的。正如沈从文所言：“他那种潇洒与宽容，不拘迂，不俗气，不小气，不势利，以及对于普遍人生万汇百物的热情，人格方面美丽放光处，他既然有许多朋友爱他崇敬他，这些人一定会把那种美丽人格移植到本人行为上来。”从沈从文的字里行间，足见徐志摩的人格魅力所在。

徐志摩在济南乘飞机遇难后，林徽因的丈夫梁思成立即赶去处理后事。他知道妻子与徐志摩友谊深厚，时常牵挂着徐志摩，特意带回一块飞机上烧焦了的木片。林徽因将这块木片一直挂在卧室床头的墙上，直到她去世后梁思成才取下。林徽因在一篇纪念徐志摩去世四周年的文章中说：“如果那时候我的眼泪曾不自主地溢出睫外，我知道你定会原谅我的。”

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诗人，徐志摩可以说是新诗的诗魂，人称“诗哲”、“诗圣”并不过分。茅盾说徐志摩既是中国布尔乔亚（即资产阶级）的“开山诗人”又是“末代诗人”，他以后的继起者未见有能与之并驾齐驱的。他的新诗可堪千古绝唱，他的行为与品格也同样受到同人、朋友、学生的赞赏与爱戴，他对爱情的执著追求虽为文坛风流佳话，亦留有诸多遗憾，但他那天真无邪，崇尚自由、平等、博爱的人道主义情怀，追求人生真谛的精神是惊天地、泣鬼神的。

徐志摩撒手而去，又似乎没有走远，他那颗追求爱情的心脏依旧在跳动，他的情诗依然在触动所有热恋中的男女：

走着走着，就散了，回忆都淡了；

看着看着，就累了，星光也暗了；

听着听着，就醒了，开始埋怨了；
回头发现，你不见了，突然我乱了！

我们都知道，爱情与事业是一个人必然面临的人生课题，因此很有必要进行一番讨论和思考。甜蜜和谐的爱情具有神奇迷人的魅力，给人以光明和力量，可以推动事业；而成功的事业也可以促进完美的爱情。爱情以事业和理念为基础，事业和理想是爱情的纽带与源泉，这是前人的生活早已反复证明了的颠扑不破的真理。对于立志成才的年轻人来说，他的爱情往往是幸福的；而盲目追求所谓爱情的人，他的爱情之果却充满苦涩。同时，爱情需要忠贞，爱情也需要成熟。花到盛开方艳丽，果须成熟才香甜。徐志摩的诗人气质既成就了他的文学地位，又注定了他在爱情方面的稚嫩。匆匆而就的一段不完美的爱情，也使得他的事业处处受挫。真正的男子汉，失恋不失志；真正的求索者，愈挫愈奋发。爱情一旦干扰了情绪，就会阻碍人奔向既定的目标。伟大的事业能抑制软弱的感情，坚定不移的志向能帮助人从失恋走向光辉的人生征途，希望当今的年轻人能从这位大诗人的经历中悟出一些道理。

“天下第二”的林损

成功的人可以给出无数条成功的理由，列在首位的就是自信和独立。很多失败者恰恰犯了一个错误，他们对自身的宝藏视而不见，反而拼命去羡慕别人、模仿别人。殊不知，成功其实就是自信地走自己设定的路。如今，中国的高校完全失去了自信和独立，拼命地与外国大学接轨，导致洋

文凭泛滥成灾，大家都争着去海外镀金。不出国念书拿个学位回来，日后想在中国学术界“拼搏”，实在很难，甚至连中文系学生也得到外国拿个汉语言的文凭腰杆才硬，这实在让人伤心。我们的高校缺的就是像林损大师这样的教授，自信而且独立，不为外界所扰，扎根中华文化沃土，他的言行的确值得当今的教育界认真思量。

有一次，一个勤学好问的学生问林损（1890—1940）：“现在国内写文章最好的人是谁？”林损回答：“第一，没有；第二，就是我了。”这就是林损的气魄，我们可能觉得林损太傲了，但是林损也确有自傲的资本。周作人在他的《知堂回忆录》里谈到林损，描写林损狂和怪是很经典的，一位名叫甘大文的毕业生拿起桌上一本北大三十三周年的纪念文章，问林损：“林先生看过这册子么？里边的文章怎么样？”林损微微摇头道：“不通，不通。”一般人到此也就打住不问了，但甘君还不肯罢休，翻开册内自己的一篇文章，指着说道：“林先生，看我这篇怎样？”林损从容笑道：“亦不通，亦不通。”这位甘君是胡适的弟子，下笔千言，文采非凡，应酬交际功夫也十二分周到，可遇见林损就一败涂地了。周作人说，林损的态度很是直率，有点近于不客气。因此，他把林损与辜鸿铭、黄侃列为北大三怪人。

据说林损长于记诵，许多古籍都能背诵，诗写得也很好。但上课经常发牢骚、讲题外话，有时信口开河。他讲杜甫《赠卫八处士》时，竟说：“卫八不够朋友，用黄米饭炒韭菜招待杜甫，杜公当然不满意，所以诗中说‘明日隔山岳，世事两茫茫’，意思是你走你的路，我走我的路。”也难为他了，这样的诗句竟能推断出杜甫交友的原则，有些让人啼笑皆非。

林损幼年就很聪明，20岁即任《黄报》编辑，与黄兴、宋教仁等宣扬革命；之后又任《新民日报》主编，写作政论，才华横溢。在担任北大教

授时，当时的北大校长胡仁源认为他的文学造诣“陈亮、叶适不能过也”。著名西洋文学家吴宓与之久谈，“甚佩其人。此真通人，识解精博，与生平所信服之理，多相启发印证”。但是，在与他同时代的众多学人的日记中，他又分明是一位恃才傲物、喜欢喝酒骂座、不拘小节的“狂人”、“怪人”，事实果真如此吗？

1914年，林损任北大预科讲师，1918年升为教授。林损是北大“温州学派”的人。既然成派，必定有一定势力。这一派除陈黻宸、陈怀这两个核心人物外，当时还有林损、林辛、章献猷、孙诒棫、许璇等温州人同在北大或任职或执教。林辛是林损的哥哥，与林损同年到北大任教；前清举人章献猷曾任民国第一届国会议员，时为北京大学职员；早年留学日本的孙诒棫是孙诒让的堂弟，曾任清史馆编纂；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的许璇是农科教授。大家都来自同一个故乡，乡里乡亲的，南方人又很团结，学术观点也没大的纷争，因此就渐渐成了气候。这种同门、同里、同派系的圈子文化极富中国特色，沿袭至今仍不乏市场。在我们现在的大学里，也是如此，校内各派系之间明争暗斗。

此时的北大还另有一派，马幼渔、钱玄同、黄侃、康宝忠、沈兼士等章门弟子济济一堂，实力堪称雄厚。沈尹默曾毫不讳言这是“新旧之争”。从京师大学堂复办到严复出任北大校长，文科素是桐城派古文家的势力范围。而随着章门弟子的相继到来，逐渐为推崇魏晋文风、注重训诂考据的学风取代。在这场推陈出新的运动中，“温州学派”也是其中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。蔡元培到任后，以章门弟子为代表的“新派势力”已经很大了。但是，这个时候又有一派横空出世。随着陈独秀、胡适等来北大任教，“文学革命、思想自由的风气，遂大流行”，引起一番“新旧之争”。这一回，章门弟子阵营出现分化瓦解，黄侃从原先的“新派人物”沦为旧的势力。由于林损、马叙伦等加入国故社，“温州学派”也被陈独秀、胡